

## 从《寿宁待志》看冯梦龙的民本思想

张高斌

对于冯梦龙，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他是“三言”的作者，明代通俗文学家，很少知道他还是一位颇有政治抱负和才干的贤明的地方官，他曾于崇祯七年至十一年任寿宁知县。清康熙本《寿宁县志》对他的宦绩做出了如下的评价：“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sup>①</sup>

至于他在寿宁期间的具体的事迹罕见于其他著作，因为他作为一名小说家，在当时看重诗文的时代是不入流的，因此不会有什么正史去为他作。我们倒是可以从他在寿宁任职期间著述的《寿宁待志》（以下简称“待志”）中了解他宦寿期间的政绩，窥见他的政治思想。因为这本书是他以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文学家特有的文笔写成的，志中材料除官文书并参考旧志外，大部分是他亲身经历或亲自调查研究得到的，所作评述论断也完全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大量篇幅是他四年宦寿生活的实录，保存了不少有关他生平经历的珍贵资料。今天我们去研究《寿宁待志》，从中可以看出在冯梦龙的吏治思想中包含着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是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光辉的组成部分。“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先哲们已经懂得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统治的特殊作用。到了孟子，他第一次将民的地位到高于君主的程度，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sup>②</sup>的政治卓见让他得出了“得其民斯得天下”<sup>③</sup>的结论，从而使“民本思想”成为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并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自然冯梦龙也是其中的一员。从《寿宁待志》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民本思想有如下表现：



## 一、重视民生 与民休养生息

儒家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即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宋代的叶适认为，关注主体人的生存意义，首先是对于主体人的尊重，叶适以人民为国之根本：“国本者，民欤？重民力欤？惜民财欤？本于民而后为国欤？昔之言国本者，盖若是矣。”<sup>④</sup>这种“重民力”、“厚民生”、“惜民财”都体现了一种民本精神。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并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要保护小农经济这个广阔基础。冯梦龙对民生就非常关注，重视与民休养生息。

冯梦龙在“待志”中曾说：“余虽无善政及民，而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无善政及民”是自谦之辞，“一念为民之心”确实是他的一贯作风。在《待志·官司》中他称赞前任知县方可正“留心民瘼，清节如水”，对“建社仓而邑多蓄积，议发赈而民无流离”的前任知县戴镗也是赞赏有加：“自知县戴镗以下，凡有功地方者，从众议立主，以存士民忠厚之意。然戴镗实宜入‘名宦’，不止私祠而已。”而他也是以他们为榜样的，事无巨细，凡是关乎百姓民生的他都予以特别地关注。民以食为天，他针对寿邑“树获俱后于他县，岁止一熟”粮食较少，提出“如遇有年，尽可储备”，并着手修复县仓，仿效戴镗的“准粮之法”，使“三年以来，储俱见谷”，“官无发粟之忧，民有乐输之便”，还准备修复戴知县社仓四所使粮食就近入仓，“凶年发赈，村民各就近领粟，亦无跋涉负担之劳”。由于寿宁不近海，山民食盐要靠外地运进，可是盐商败本回籍，本县商船又因海寇袭扰被焚烧，商本益削。为了保证食盐的供应，冯梦龙“熟筹盐策”，认为除灶户外，惟有招徕商人。可是商船不够，于是他想出“照大盐事例，计户食盐”，“每乡设立官牙”，实行承包，“询之各商，皆云可行”。但这一决策因“文未批转”，实行与否不得而知，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百姓生计的关心。减轻赋役，是冯梦龙经常提到的话题，《催





征》诗中，他同情“寿民之艰”，希望“长民者”“惻然”，“当路者”“垂怜于万一”。而最能体现冯梦龙简政轻赋、与民休养生息的，莫过于关于大造黄册及迎新送旧的“条陈”。明清时，规定每十年一次大造黄册，每造黄册，须重新登记丁口、田粮，事繁费大加上寿宁甲长识字者不多，要雇人承办，承办者借此敲诈勒索，费一开十，冯梦龙认为“这是二十图公共大费之苦也”。有鉴于此他在条陈中建议责成各甲造成细户花册，到下轮造册时，只需审丁，不需查产，可节省大半工程。关于迎新送旧的“条陈”，是言一般县官所不敢言和不愿言。寿宁每次新旧官员离任到任，肩輿费、修衙门备家伙费，全都摊派给乡民。而承包此事者又往往用少报多，致使“图民遂有典妻卖子犹不能偿者”。于是他在条陈中提出要“酌定新任应路费若干，离任应路费若干，画为定规，通县均派，竟送本官自行备办，此外不许需索分毫”。虽然他的前一条条陈不知是否被上级所采纳，而后一项条陈是被驳回，但他“一念为民之心”重视民生的精神可见一斑。

## 二、兴文立教 矫正陋俗

儒家的民本思想十分注重对民的教育，引导人民积极向“善”，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sup>⑥</sup>这就是要人们重视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另外文化落后，文盲多，也不利于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展开。因此一些开明的富有民本思想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教育。既是文人 又担任过丹徒训导的冯梦龙自然也是如此。

“寿邑山险而逼，水狭而迅，人感其气以生，故性悍而量窄，虽锥刀之细，骨肉至戚死不相让”，“逆理犯上弗忌也”。无怪乎《待志·都图》提到“民极顽”、“民顽”、“民稍顽”有二十六处之多。另外寿民还有“信巫不信医”，“重男轻女”、“生女则溺之”等陋习。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依赖教育，可寿邑“学校虽设，读书者少，自设县至今，科第斩然。经书而外，典籍寥寥，书贾亦绝无至者”，于是冯梦龙“立月课”，将自己所著《四书指月》颁发给诸生，并亲为讲解，每月到学宫讲课一次，这

在我国古代的地方官中是绝无仅有的。寿宁的县学在冯梦龙上任前就已倾圮很久，冯到任后，教谕廖灿，训导吕元英“皆留意作兴”，他表示支持。

“适有详过修学赎锾二十八金，余益以二十余金”，进行修缮，“棖星门腐朽乏大木”，他就“捐俸代输，伐其木，募人致之，鸠工斫削”。一个县官，拿出自己的薪俸修县学，不简单。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县学终于“堂宇载整，学门重建”，“朱丹既饰，视昔加焕焉”。寿邑“重男轻女”、“生女则溺之”的陋习，是对女性人权的极不尊重，也会造成男女比例失调，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于是他以通俗文学家特有的通俗明白生动的语言写了《禁溺女告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严之以法，“且捐俸以赏收养者”令“此风顿息”。另寿人“信巫不信医，每病必召巫师迎神”，这样延误了治疗，使病情加重，甚至丧命，还浪费了钱财，使家庭陷入困境，冯梦龙“示禁且捐俸施药”，使得“人稍知就医”。

### 三、勤政爱民 求真务实

冯梦龙在《待志·里役》中曾说：“余生平作事不求名而求实。”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缘于他的勤政爱民。为了更好地施政，他对全县行政区域内的二十二图、二百二十甲的地理位置、民风民俗、资源特产、产粮纳粮，做了详尽地调查和叙述，特别是归纳出了“粮少难完，粮多难完，粮少粮易”的图甲，对纳粮工作作了细致地分类指导，以避免乱摊派。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冒着得罪官僚的风险，如实向上级官府条陈“大造黄册”和“迎新送旧”两件最为害民的事，要求进行适当的改革。为了避免审丁工作带来社会不公，引起民怨，他从实际出发，认为“时有平乱，岁有稔歉，政有善败，家有消长，第减之，则蒙流亡之谴；增之，则饴加赋之累”，要求“后之审丁者慎诸”。为了避免冤假错案，他对姜廷盛诬告之案，进行微服察访，实地调查，惩治了真凶，并告诫继任者“假使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必为信理所误矣。令此地者当知之”。为了不给地方百姓增累，对于产于托溪西岩寺的方竹，作了认真调查，得出“然细甚不堪作杖，志（指旧志）亦混载，毋使后有求者，为地方累”的结论。他的这





种勤政爱民，求真务实的精神，当令现今的一些虚报成绩、欺上瞒下、作风浮夸的官员汗颜。

#### 四、保境安民 除暴安良

儒家的民本思想非常注重“安民”，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会稳定，否则“国恒亡”。孟子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就是这个道理。冯梦龙作为一名地方官也把保一方平安当作自己的职责。寿邑虽小，且处万山之中，但历史上也常遭倭寇或山寇的袭扰，据《寿宁县志》（康熙本）记载：“嘉靖三十八年，倭寇自浙来，突至一都、四都掳掠，合邑惊惶逃窜。四十一年，倭寇陷城，伤害男妇不可胜记。四十二年山寇刘大眼攻城焚屋，惨如倭寇。”冯梦龙到任前，县城城门曾遭倭寇残毁，“四门荡然，出入不禁”。冯初莅任，“即以忧深牖户，万难坐视事，申请各台蠲俸蠲赎，重立四门谯楼，城之崩塌处悉加修筑”。冯梦龙认为“闽防在海，而福安正海艘登陆之地，昔年倭亦从此道”，于是他把车岭、绝险、铁关、院洋四隘当作要害之地，要求守隘者以銃为第一守隘之具，并多蓄硝磺。当时寿宁守兵“素不娴武”，冯梦龙就“立正教师一名，副教师二名专主教训。月必亲试，严其赏罚”，使兵士“知自奋，有稍暇即往演习”。对于寿邑兵士缺军粮问题，他也煞费苦心，多方营求，“愚意军粮既不便转移，宜将本县解府、驿递、盐钞等项钱粮，准扣抵七十二两之数存县，使军粮月于本县请支，则卫无虚冒，而县仍得拾军之用”。

另对于危害百姓切身利益和生命的恶霸和“虎暴”，冯梦龙也巧妙地加以惩治和消除。这也许是他的得意之笔，《寿宁待志》中就详细地记载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微服察访，查清姜廷盛诬告之案；二是智擒恶霸陈伯进之事；三是他刚到任，听说“西门外虎暴，伤人且百余矣”，就捐俸造数具虎阱，“置虎常游处，并悬赏一虎赏三金”，“半载间，山后、溪头及平溪连毙三虎，自是绝迹”。

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冯梦龙的民本思想，即“一念为民之心。”但他的民本思想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以忠君为前提，存在“忠君”与“泽民”的矛盾

作为明王朝的地方官，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他肯定是要执行朝廷的政令的。从《待志》中的言论看，他是忠于明朝皇帝的。他一边同情“寿邑之贫”，“寿民之艰”，希望“长民者惻然”，但一边又要完成封建王朝交给的搜刮民脂民膏的任务，只好感叹“聚敛非吾术”却仍得催征聚敛，以“奉至尊”，把忠君放在第一位。这在他的《催征》诗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聚敛非吾术，忧时奉至尊”。特别是尾联“安得息烽烟，敷天颂圣恩”，他把农民“带青砦早稻，垂白鬻孤孙”的惨状，认为是由外族入侵、农民起义，而朝廷不得不向农民摊派造成的，却不知道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重重压榨，兼并聚敛，才导致外族入侵、农民起义的，倒因为果，为明朝统开脱责任，还寄希望于皇帝能息烽烟。由于崇祯皇帝横征暴敛，加上地主阶级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引发各地农民纷纷起义。而对于农民起义，冯梦龙是极力反对的，《寿宁待志》中就记载他向朝廷“陈剿寇第一要策”。与他同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相比，他的民本思想远不如黄宗羲进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sup>⑥</sup>他还批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sup>⑦</sup>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我看冯梦龙就有怕“危吾君”而“讲治之牧之之术”之嫌。

### 存在想造福一方百姓而又功名心切的矛盾

冯梦龙在宦寿前就已写成的“三言”中曾刻画了“吏肃惟遵法，官清不爱钱，豪强皆敛手，百姓尽安眠”沈鍊；“为官清正，……听讼明决，冤雪理滞，果然政简刑清，民安盗息”的石璧；“下车之日，宣扬皇化，整肃条章，访民瘼于井邑，察冤枉于囹圄，屈己待人亲耕劝农，宽仁惠爱，劝化凶顽”的钱易等一系列造福一方百姓的清官形象，以寄托他对贤明政治的憧憬，展示自己的远大抱负。到任后他决心以他们为榜样造福寿宁人





民，针对寿宁“岭峻溪深，民贫俗险”的特点，提出“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谿戍，可使无讼”的政治主张，明知“寿令不可为”而为之，尽量使自己“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但他又功名心切，不满足于“七品芝麻官”，对于寿邑自万历庚寅到崇祯甲戌，四十五年间十五任县令只有两人擢升的状况而愤愤不平，发出“他岂尽不肖，为一州五十八县之下流哉”的慨叹。因此他对可能妨碍个人前途的一些民本思想、政治措施，施行起来就不够坚决，不够彻底。最典型的莫过于处理“升科”一事。所谓的“升科”，即因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广粮赋，这是上级官府对下属官吏年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在很多荒芜土地的北地多加开垦是容易办到的，而寿邑“尤嵌岩逼窄之区，沙浮土浅，梯石而耕，连雨而漂，连晴则涸”，实际上无地可扩，历来所报升科“皆故田”是虚假成绩，而人民不免受“赔累之苦”。冯梦龙深究此弊想用升科数抵悬欠数，可是手下吏书劝谏说“升科系考成一款，必不可少”，他也只好“不得已而听之”，类似的情形在“待志”中还有几处。但他爱民之心还是没有泯灭的，在“升科一事”上，他深感内疚，并说：“异日见景云，当下数升愧汗矣。”

### 把事神放在治民之前

冯梦龙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很深，或是和封建统治者一样，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以愚黔首，把“事神”与“治民”并列为“有司之责”，且把“事神”放在“治民”之前。他在《待志·香火》中说：“余谓事神、治民，有司之责，未有不能事神而能治民者”，把“事神”看得比“治民”更为重要。于是他认为“城隍一邑之主，有事必祷”，大谈马仙轶事，捐俸建关庙、天地坛，改马仙宫。这将大大影响民本思想的实施，若用这些人力、物力去修社仓、建癩民养济院，为民多办点实事，岂不更好。

### 在劝课农桑，制民之产方面缺乏具体的措施

我国是农业国，农业是经济命脉关系民生，因此我国古代的儒家的民本思想非常重视劝课农桑，制民之产。孟子曾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sup>⑧</sup>可是我们在《寿宁待志》中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措施。不知是冯公在这方面有采取一些措施，而《寿宁待志》未加记载，还是寿民本来就知道怎么做，毋须指导？

但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苛求古人，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总的看来，瑕不掩瑜，冯梦龙是大有功于寿宁人民的贤明地方官。他来“岭峻溪深”、“山高水寒”的寿宁任知县，对他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但对寿宁人民来说是大幸。他“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曾恩泽过寿宁的先人，今天单凭这本《寿宁待志》就使寿宁的名声远扬，并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民本思想，在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为民”<sup>⑨</sup>的当今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他的勤政爱民、求真务实思想对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有教育意义；第二，他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思想对于加大减轻农民负担、禁止乱摊派、乱收费的力度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第三，他的兴文立教、矫正陋俗、重视教化百姓，与当今时代我们重视教育、提高人民素质、科教兴国有相同之处。要是我们的一些地方官都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他的民本思想，那么一定能造福一方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地方繁荣昌盛。

（作者系寿宁县第一中学教师）

### 注释

①清康熙本《寿宁县志》

②《孟子·尽心下》

③《孟子·离娄上》

④《叶适集·水心别集·国本上》

⑤⑧《孟子·梁惠王上》

⑥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⑨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文中引文除以上标明出处外，均出自冯梦龙《寿宁待志》。



## 弘扬冯梦龙文化的优良精神

卢美松

冯梦龙是江苏苏州吴县长洲（今相城）人，他以 2000 多万字的文学（史志）作品，享誉文坛，被誉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先驱和民间俗文学的泰斗。他的作品以“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著称，此外还有特色作品如《山歌》、《情史》、《智囊》、《挂枝儿》、《新列国志》和《古今烈女演义》等书。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容，是一份值得珍视和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倡行正确的核心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冯梦龙文化或称冯梦龙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成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冯梦龙倡导的“情爱观”具有进步价值与积极意义。他把真情放在崇高、圣洁的地位，认为它是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他热情描写和歌颂忠贞的爱情，无情鞭挞虚情、滥情行为，坚决捍卫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爱情观。他描写的人物爱情故事，体现真善美的本质，遵循传统礼仪和道德，有理有节，强调相互尊重，彼此信诺忠诚。基于此，他歌颂劳动人民和社会底层人士的真挚情感和坚贞爱情，刻画人情、人性生动精彩、入木三分。他搜集、整理的民歌也极具真情实感，表达真性情与纯洁的爱情。

二、冯梦龙在真诚的“情爱观”的基础上，主张“情教说”。他把人情、爱情、真性情置于崇高地位，以此为基础对民众百姓进行情爱教育。如他所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他倡导情教，欲以情化人，以情感人，即以真性情感动和教化众人，这在教

育史上是独创的新说，也是新的教育方法。由此也可见他对人间真情的真诚喜爱和热烈追求。这在当代教育特别是幼小教育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对于幼儿和青少年而言，爱的教育、情感教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教育，也是特别易于入耳入心的直观教育，是值得倡导与坚持的。

三、冯梦龙还主张“以义取利”，这是他适应明朝中晚期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时局的表现。这种新的义利观，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狭隘观念。他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在他的以商业活动为题材的作品中，在描述商贾的思想与活动中，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观念。在他的笔下（主要在“三言”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正面的商人形象，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这些商贾人物，或以诚信为本，体现谦谦君子之风；或以贵和尚中为经营理念，达到结缘生财的目的；或是仗义疏财，从事公益活动与慈善事业。其所倡导或鼓励的都是正面的义利观与用财观。这些思想理念，对于今天我们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弘扬优良的传统道德观念、坚持正确的理财观念、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与现实意义。

四、冯梦龙从以文化人的指导思想出发，撰写大量文学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为题材，通俗、生动地讲述理想道德、生活哲理、待人处事方法与为人谋生的经验，极具感染力与教化作用。如“三言”作品中，讲述的许多道德与经验，都不是道貌岸然的说教，或枯燥无味的陈述。他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并结合进行道德观与人生观的陈述。如他塑造的清官形象，十分生动而亲切，令人信服，这一形象实际上表达了他自己的当官经历、人生体验与道德理念。他六十一岁才入仕任官，以清正廉明为准则，恪守官箴，以身作则。如在寿宁县令任上，他改革吏治，兴文立教，废除陋习，表彰正气，微服察访以了解民情，自奉廉俭以树立榜样，因此迅速改变一方吏治，做到“政简刑清”，待士有礼，遇民于恩。他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也为了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特别“首